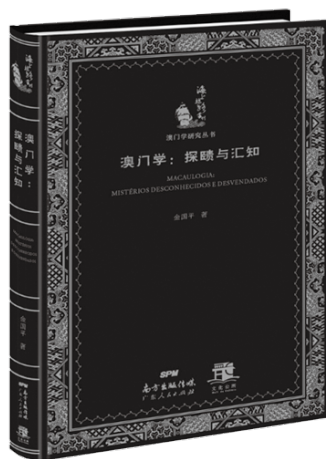


澳門學著作提要（三十七）

宋玉宇

一、金國平著《澳門學：探蹟與匯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259頁。



著者金國平，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及葡萄牙語專業畢業。葡萄牙歷史科學院院士，2009年獲葡萄牙共和國總統授予殷皇子級紳士勳章。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澳門研究院研究員。在葡萄牙從事歷史工作超過20年。主要個人、合作及譯著：《中葡關係史地考證》、《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Revisitar os Primórdios de Macau: Para uma Nova Abordagem da História*（《澳門起源新探》）、《早期澳門史論》、《過十字門》、《東西望洋》、《東西望洋》、*Correspondência Oficial Trocada Entre As Autoridades de Cantão e Os Procuradores do Senado*（《粵澳公牘錄存》）、《澳門紀略》（葡萄牙語新注釋版）、《艾青詩選》（*Poesia Escolhida de Ai Qing*）、《大明國圖志：羅明堅中國地圖集》（*Atlas da China de Michele Ruggieri, Atlas of China by Michele Ruggieri*）、《遠遊記》、《大西洋銀行錢譜》等。

本著作屬“澳門學研究叢書”系列之一種，共259頁，全書由《放寬視野，深耕細作，構建澳門學的話語體系——寫在〈澳門學研究叢書〉出版之際》、《編者的話》、序言、正文、跋組成。

第一篇《澳門傳教史之“colégio”：定義、譯名與沿革》，利用諸多首次徵引的葡語文獻，通過對“colégio”的定義、“colégio”譯名漢譯歷程、“colégio”（總院）存在的歷史沿革研究，全面探討了“colégio”問題，澄清了在現代葡語中並不是“學院”或“大學”之義，其本是羅馬法和教會法的概念，最常用此意為“私立中學”，偶有專科學院之義。在耶穌會中，它是會省或副會省下的一跨區域或跨國度、由三位以上的神甫組成的內部共同管理多部門的自治領導機構。明清文獻一般譯為“某某堂”。民國時期，耶穌會自己的定譯為“總院”，其負責人稱“院長”。

第二篇《琉球閩南華裔“Cheilata”之生平與事迹——兼考“Os Gores”》，分為引言、“Cheilata”之生平與事迹、兩波交匯馬六甲、貿易中心遷移北大年、葡語記載中的琉球與琉球人、葡人與琉球閩南華裔的接觸、葡人努力尋覓琉球、琉球閩南華裔與澳門、結語。通過對照葡萄牙語文獻及琉球漢語古籍《歷代寶案》，說明葡萄牙人在馬六甲接觸的“華人”應該是三十六姓開琉球的閩南人的後裔，而且考證出了“Cheilata”的漢語姓氏。這也是一種對澳門開埠史研究的新探索。琉球閩南人可能是澳門的先民之一。

第三篇《關於西班牙藏〈古今形勝之圖〉作者的新認識》，分為學術回顧、地圖作者、刻印地點、中外影響、送出者考和結語。通過中國古籍《薛荔山房藏稿》卷六所載《塘湖甘公傳》的確鑿記載，考證出了關於西班牙所藏《古今形勝之圖》作者為甘宮的明確文字記載。金沙書院在《（崇禎）海澄縣志》中的具體地點。澄清了《古今形勝之圖》的最早編者為“宋學士鄭韶”。

第四篇《關於〈亞馬港全圖〉的若干考證》，分別論述了《亞馬港全圖》的出版日期及作者、作品及刊者、影響，並對目前流行的錯訛作出探討與辨證。考證出其素材來自於羅俄洛夫斯（Roelof Roelofsz）和范·佈雷（Jan Harmensz van Bree）關於東南亞遊記的信息。《亞馬港全圖》是“具有文獻與藝術雙重價值的地志畫”，“具有代表性和象徵意義的藝術品。作品描繪了澳門開埠時期的面貌，對瞭解澳門的早起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①

第五篇《葡萄牙語“Ilha de Macao”的涵義與指稱》，利用了大量中外文文字及圖像資料，介紹與分析了“Ilha de Macao”（澳門島）一語的指稱範圍，得出了無論是在漢語中，還是在葡萄牙語中，它除了是指“香山縣”外，有時還指澳門的結論。

第六篇《明末葡萄牙語文獻所記載的“Queve”之漢名考——兼探李葉榮外文姓氏的來源》代表着澳門史研究的一個突破性進展。它詳細地探討了明末葡萄牙語所記載的辭彙“Queve”及其在另外一些歐洲語言中的異體的來源。運用各種資料證明了“Queve”雖然可能是閩南語“契子”或“儉仔”的對音，但所表達是“包攬”的概念。其使用的歷史要早於澳門，其傳播程度之廣令人歎為觀止。首先從中文進入葡萄牙語，然後再從它進入荷蘭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幾乎包括了所有東來的歐洲貿易先驅的語言，通過對“包攬”（Queve）和李氏家族意大利姓氏“Neretti”來源地考證，使“廣州—澳門”外貿體系管理機制的運作有

①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基金會，2005年，第165頁。

了更具體而清晰的認識。

第七篇《澳門與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興起》，作者再次是從語言學進入歷史領域的，因此，寫這類語言考證文，自然是得心應手。此文有三大學術進展：(1) 最早傳入波斯文的形式是漢語“檳”對音(今寫，讀chay)；(2) 從葡語文獻來看，可以確定的是，葡語“cha”是對日語的轉寫，即“cha”的直接詞源是日語，它是日語和葡語接觸後所產生的一個借詞；(3) 總結了80多條非常生動、表現力巨大的葡萄牙語短語，說明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豐富程度並不亞於漢語。

第八篇《伊比利亞文獻所見“克拉克瓷”名實考》，分為“克拉克船”與“克拉克瓷”、西語文獻中的“克拉克瓷”、餘言三部分，解釋了“克拉克船”和“大帆船”是兩種區別甚微，但又有所不同的船隻；系統地發掘了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中關於“漳州瓷”的史料，解釋了何為稱“克拉克船”和“克拉克瓷”，並以文獻證實了“克拉克瓷”便是“漳州瓷”，更給出了相應的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名稱。“漳州瓷”的顯著特點是胎體粗厚、製作粗率及器底與圈足粘有不同程度的粗砂，為漳州“克拉克瓷”。

第九篇《葡萄牙語史料中是否有關於明“十三行”的信息》，通過對澳門早期通商外文史料的仔細梳理，回答了一個數十年來令學術界聚訟不絕的問題：十三行最早起始於何時？得出的結論是迄今葡萄牙語史料中未見有關於明“十三行”的信息。而現知的西文出版物亦無涉及，而漢語史料卻先行了一步。作者期望能系統地爬梳早期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及拉丁文檔案及後來建有商館的所有國家的檔案，從而給“十三行”研究帶來突破。

第十篇《葡萄牙語“(Hão)行”字系列詞彙研究》，通過對有關葡萄牙語文獻中關於“十三行”和“行(Hão)”的研究，初步探討了行“行(Hão)”、公行(coham)、行商(anista)與行用(anistagem)等與“十三行”有關的歷史詞彙出現的年代及其所指。該篇匯集了外語中對“行(Hão)”字的各種記載。十三行(The thirteen hong)是對歐洲人在廣州所在地的稱呼，它來自於早期在此有過十三家華人行商(thirteen Chinese hong merchants)或更正確的漢語稱呼是洋行商(merchants for foreign)，歐洲行(European factories)有時稱作夷館。

第十一篇《德庇時與〈通商字彙〉——“公班衙”及“十三行”相關詞語之時譯析讀》，通過從《通商字彙》中摘錄並析讀若干關於“廣東和澳門以及兩地間貿易的中文詞語及短語”及“行商”的“稱呼”，明確指出明確地指出，十三行(shih-san-hang)的定義是“European factories at Canton”(廣州歐洲諸行)，即廣州“夷館”。

第十二篇《澳門“叻咁花園”主人之漢名及位置考》，篇章包括漢名考、位置考及餘言，文中利用大量圖像及地圖材料考證出了19世紀著名的“百鳥巢”位於“叻咁花園”內，其主人為英國倫敦人Thomas Beale，“叻咁花園”和“百鳥巢”位於澳門的卑弟巷。同時指出澳門不僅僅是彈丸之地，它更是西方文明向大陸，乃至東亞輻射的源點和東西文化的最佳交匯點。

第十三篇《上海近代西式動植園之興起——澳門“百鳥巢”遷滬記》，講述了“百鳥巢”遷滬的故事。比理(Thomas Chaye Beale)在寶順行花園內，在其父“百鳥巢”的基礎上，發展起了“鹿場”及“鳥場”，成為上海近代西式動植園興起與傳播的起始。

第十四篇《“江沙維”神甫自用姓氏考》，通過探討《16—20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政府憲報》等，考證出“江沙維”並不是他本人認可使用的漢語姓氏。神甫自稱姓

“公”，即其葡語父姓“Gonçalves”第一個音節的音譯。

第十五篇《澳門“綠衣兵”考》，分為澳門早期警容組織之沿革與“綠衣兵”考兩部分，回顧了澳門早期警察組織的沿革，考證了“綠衣兵”的詞源，尤其是解釋了葡萄牙語中的漢語借詞“loucanes（綠軍）”與“綠營兵”的聯繫，得出“綠衣兵”在澳門既是警察又是華人與葡萄牙高級警官溝通的“舌人”。

第十六篇《羅爾綱之“馬碣”情緣——兼論〈赴澳門查華夷地界〉報告》為我們講述了羅爾綱作為澳門女婿的“馬碣”情緣，分為澳門女婿及師從胡適兩部分。羅爾綱以太平天國史、晚清兵制史研究飲譽中外，發表了以澳門為背景是自傳體小說《老鳥征途》。1928年撰《媽港集》，此書分為小說、散文和考據三部分，各為一集，但尚未刊登，已佚。羅爾綱還幫助過其師胡適整理過胡父胡傳撰寫的《胡鐵花遺集》、《赴澳門查華夷地界》的報告。無論就其早年寫下的澳門考證而論，還是他整理和披露的胡傳關於澳門勘界的寶貴史料而言，羅爾綱先生無愧於澳門學研究的先驅之一。

二、葉農著《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276頁。



著者葉農，1964年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1982—1989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學習，師從中國著名文獻學大師潘景鄭、顧廷龍、胡道靜三位先生，學習歷史文獻學，並獲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2003—2008年，在暨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9年至今，任教於暨南大學，此外，還兼任中國澳門學學會副理事長、澳門城市學會副理事長、廣東省市場經濟促進會秘書長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史(港澳史)、基督教傳華史、海外漢學、歷史文獻學。有《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澳門編年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國駢文發展史論》（澳門：澳門文化藝術學會，2010年）、《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61）的澳門》（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3年）等著作。並在《民族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幾十餘篇。

此著作是《澳門文化叢書》系列的一種。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為推介研究澳門與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學術成就，促進學術界對澳門的關注，在文化局成立30周年之際，特別策

劃並資助出版該叢書。

該書共有六章：第一章《渡海求生：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分析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每個時段澳門葡萄牙人遷居香港的原因，包含海盜襲擾、澳門政治轉型、中國內地政局動蕩、香港開埠影響、自然災害與自然環境的變化等；總結歸納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的過程中，相較於其他地區移民的與眾不同的特點。最後，通過選取羅沙家族、奧馬達·卡斯楚家族、巴萊托家族等具有代表性的實例分析，來研究遷港的葡萄牙家族。

第二章《重生之道：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觀察》，通過歸納整理《中國叢報》、《華西友報》等相關資料。探討澳門葡萄牙人遷居香港後，成為香港歐人社會的組成部分，他們為謀生和致富在香港從事的職業。主要職業是職員和譯員，也有港英政府的僱員、商業機構和公司的職員、從業於新聞出版界、涉足醫藥行業、開設商行與從事經商活動，分佈在香港社會各界，為香港建設作出貢獻，並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

第三章《家族聚居：社會生活探析》，澳門葡萄牙人以家族形式遷港，終於在19世紀末達到一定規模，形成了一個新的社區——香港葡葡人社區。這個社區的社會生活內容包含：定居香港葡萄牙人的家庭生活、社區生活、語言問題、飲食文化、公共服務等社會生活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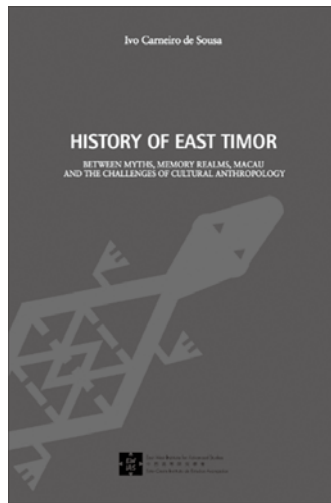
第四章《精神慰藉：宗教、慈善與教育》，主要研究定居香港的澳門葡葡人為維繫其族群的穩定，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與生活方式，堅持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組織屬於葡葡人社區的慈善機構，成立為族群服務的教育機構。

第五章《機會來臨：葡萄牙人移居香港對澳門的影響》，分析了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使得澳門經濟生活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蕭條，但也推動了澳門經濟的轉型，促使華商崛起並掌握澳門經濟命脈。

《結論》，對前五章的論述進行總結陳詞。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問題，是港澳史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學界目前的研究還待進一步完善。

前有《緒論》，概述了學界關於澳門土生葡人和澳門葡萄牙人遷居香港的相關研究成果，說明此著作的現實意義與方法論，理清“澳門葡萄牙人”的基本概念。後附有參考文獻。

三、Ivo Carneiro de Sousa, *History of East Timor*(《東帝汶歷史》),
EWIAS: East-West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2018, 170 p.



著者Ivo Carneiro de Sousa(蘇一揚)，波爾圖大學葡萄牙文化博士，原澳門聖若瑟大學副校長，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學術副院長。蘇一揚教授長期從事東帝汶歷史及人類文化學研究，參加不少關於研究東帝汶歷史文化的國際學術會議及講座，曾發表關於東帝汶的文章有“Throughout Bidao, in East Timor, with Antonio Pedrosa or How a Certain History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Shifts into a Community Myth”、“Mercantilismo, Reformas e Sociedade em Timor no Século XVIII: O Regimento do Capitão das Ilhas de Solor e Timor de 1718”等。

本著作共有六篇。前言為作者出版該書的背景及期望，正文分為六個章節：“Introduction to East Timor Through Myths,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Pre-History, Ethnicity, Languages and the Formation of East Timor Pre-colonial History”、“Lineages, Alliances and Politics, Colonial Rule and Social Anthropology”、“Portuguese and Luso-Asian Legacies in Southeast Asia View from Bidao, East Timor”、“Philip II, East Timor,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True King of Timor and Portugal”、“Sandalwood, Traders,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Emigrants History of Macau - East Timor Relations”，後有參考文獻。

第一篇“Introduction to East Timor through Myths,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講述東帝汶神話故事、歷史傳統和文化人類學。通過講述“Textos em Teto da Literatura Oral Timorenses”中關於鱷魚用背部搭載男孩過河而放棄吃掉男孩、進而逐漸變成東帝汶大陸和石頭的神話故事，論述了鱷魚圖騰在東帝汶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這只是神話故事，東帝汶殘留下來的歷史遺迹及年長者們也很難口述出關於他們國家的歷史傳統。作者論述了Pinto Corrêa書中關於東帝汶人過去缺乏物質文明的觀點，而這種物質文明是伴隨着東帝汶的殖民史而產生的。這些遷徙者們從馬六甲、摩鹿加、弗洛雷斯、索洛、恩德、潘塔爾、西帝汶、阿塔普圖、葡萄牙、中國澳門等地方而來，在東帝汶生活、貿易，共同編寫了東帝汶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國家是人民通過抵抗、革命和民族認同價值觀建立起來的，通過東帝汶的殖民史強調民族情感在國家建設中的重要性。

第二篇論述史前文明、種族、語言和前殖民地歷史。開篇介紹東帝汶史前文明的情況，論述通過商業貿易的發展而傳到東帝汶的印度和印度佛教文化和意識形態價值觀對東帝汶的影響，然後論述東帝汶的種族和語言，通過神話故事引出東帝汶經過長期的社會分化和社會分割而形成的七種古老的語言：(1) 白奎諾語(Baiqueno)、(2) 布納奎語(Bunaque)、(3) 德頓語(Tetum)、(4) 曼貝語(Mambae)、(5) 馬卡薩語(Makassae)、(6) 法塔盧庫語(Fataluku)；(7) 馬庫亞語(Macua)。作者也提出對語言多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必須融入到東帝汶的歷史、地理位置及葡萄牙殖民史中。接着論述伊斯蘭教及商業時代，通過論述“Documentação para a História das Missões do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考證了東帝汶的檀香木貿易競爭和宗教對抗之間的密切聯繫，但穆斯林對東帝汶的干預只是間接的，僅限於少數地方。得出除了少數沿海貿易區之外，帝汶從來沒有受到過明顯的伊斯蘭化的結論。大多數當地居民不僅無視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而且還習慣於將其傳統文化和宗教習俗作為其社會制度和人際關係的固有組成部分。最後論述第一批天主教傳教士與帝汶群島前殖民的歷史。共四部分。

第三篇論述譜系、政治聯盟、殖民統治和社會人類學，從大量史料、傳說、神話故事入手，分析東帝汶氏族譜系的歷史沿革，譜系得已傳承的現實物質條件，殖民歷史對譜系氏族的影響，社會婚姻關係的傳統及發展，東帝汶傳統的宗族觀念伴隨着葡萄牙的入侵而帶來的文字、姓名、姓氏方面的變化，以及傳統文化受到的撞擊和挑戰、檀香和咖啡貿易的變化。

第四篇從帝力為出發點探討葡萄牙和葡亞遺產，包括Bidao的神話與歷史、葡萄牙在天堂、永恒回歸的神話三部分論述。作者從2001年在東帝汶的親身經歷出發，談及東帝汶的神話與歷史、葡萄牙人如何來到這個小島定居結婚生子、東帝汶人對葡萄牙的模糊認識、認為葡萄牙在天堂的文化觀念。任何一個社區、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需要神話，他們通過公共雕像、街道名稱、公民紀念活動以及人們的社會身份、集體記憶傳播。

第五篇討論腓力二世、東帝汶、菲律賓人以及帝汶之王和葡萄牙。該篇介紹了索洛一帝汶的自治政府、伊比利亞聯盟與葡萄牙的“東方”帝國、菲利普二世與帝汶—索洛的殖民統治、葡萄牙和帝汶的東帝汶國王等問題。分析了菲律賓宗教人員是東帝汶天主教會牧師和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菲律賓和東帝汶文化的關係、葡萄牙人的到來與東帝汶貿易發展的關係。

第六篇論述檀香、商人、傳教士和中國移民、澳門東帝汶關係史。文中用大量的史料和文獻探討檀香木和奴隸的貿易、中國的移民到東帝汶、澳門關於東帝汶的資料及文物。從澳門和東帝汶歷史文獻資料中涉及貿易和人民、戰爭和金融、行政和宗教出發，思考和理解並討論東帝汶。並強調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驕傲的民族性格。

文中涉及史料、神話故事、引用文獻共339處，最後有本書的參考文獻。

[責任編輯 陳超敏]